



晚年的王金璐先生依然精神矍铄



京剧《蝶恋花》中,王金璐饰万鸿飞(右)

武生泰斗王金璐： “京剧男神”难再寻

武生泰斗王金璐先生于6月1日早晨逝世。

已经怕了,对于这样的消息:京剧“武生泰斗”王金璐先生去世。

然而又能如何呢,先生们都老了。王玉田、吴素秋、梅葆玖、李世济、王金璐,都在2016年上半年先后离世,单就人才结构而言,这一年是梨园行的“大败局”,这一次是输给了无法对抗的时间。

因为坚韧的精神、卓绝的技艺,王金璐被诸多戏迷称为“最帅的男人”“真正的男神”。摔坏过脊椎,腰部韧带大面积撕裂,竟然不可思议地重返舞台;白发苍苍,还能把腿高抬过额。

这样的人,以后还会有吗?这一问,恐怕也是大部分老先生们的遗憾之问。

► 学戏是为了吃一口好饭

央视纪录片《粉墨人生》,第一集就是专门介绍王金璐先生。面对镜头,说起学戏时的艰苦,当时93岁的他老泪纵横。

1931年,王金璐12岁,进入新式科班学戏。因为戏子是“下九流”,病榻上的母亲气得摔了杯子。星期天是家长探视日,去看王金璐的是捡破烂的干爹,给他带的“好东西”就是一毛钱一大包的点心渣子。

“拿点心渣子当好吃的……”老人家再也无法控制情绪,“您别问我这个,说不下去。”

当时的王金璐,志向就是“学好戏,当好角儿,吃香的喝辣的”。这就是他学戏的目的,其实也是那一代的梨园前辈们普遍的出发点。今天因为尊敬,人们对京剧大师们的过去进行了过度包装,但都属于事后的精神赋予。今天倘若和一些专业的京剧演员谈起为何要学习京剧,了解京剧,欣赏京剧,马上就会有一堆大词飞过来:国粹,博大精深,老祖宗留下来的优秀文化……可惜大词不能当饭吃。

王金璐演的第一出武戏,是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。那时科班的老师跟学生们的约定是:演好了,一人20个包子;演不好,一人20下板子。不得不说,那个时代京剧的样貌,才是它的本来面目。学戏,第一,可以吃饱饭,第二,天地广阔,说不定还能吃上一口好饭。

新中国建立以后,京剧还曾延续了十几年的繁荣期,之后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,进入了凋敝期,传统戏甚至禁止演出,老艺术家们销声匿迹。从娱乐变成“国粹”,从吃饭的技艺变成“为往圣继绝学”的神圣使命的过程,就是京剧从主流大众文化变成一种亚文化的过程。

► 观众是京剧繁荣的根基

边缘化的过程具体是怎样进行的呢?在不理智的年代,传统戏不准演,无疑首先发出了致命一击。

改革开放前,王金璐的最后一次演出是在1959年,河北邢台,由于工作人员操作机关失误,王金璐被摔成重伤,脊柱变形,腰部韧带大面积撕裂,医生宣布他再也不可能重返舞台。

此时,演戏之于王金璐除了是谋生的工具外,早已成为了他热爱的事业。精神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,他从连弯腰都有困难开始,用了2年多的时间锻炼,竟然奇迹般地恢复。

然而恢复之后已无戏可演,王金璐只能在夜深人静之时,与夫人李墨璠先

生坚持无声地练习,行话叫“默戏”,十几年来一刻不曾放松。当1978年传统戏开放,文化部让艺术家们报戏的时候,王金璐报上去的是高难度的《挑滑车》,震惊众人。后来的演出非常圆满,人们都说,“武生泰斗”王金璐风采再现。

尽管艺术家们努力重整旗鼓,但十几年不演戏的打击,真正的重创在于观众。十几年足以成长起一代新人,他们的成长期缺少丰富的剧目熏陶,欣赏能力已经几近断绝。而缺乏黑格尔所说的“艺术的可直接解性”的京剧,又很难让观众“一见钟情”。

我们发现,老一辈艺术家们身上一个共同点——特别在意观众的反映,把观众当成衣食父母。这一点很重要。

王金璐为了“吃饭”而学戏的时代,是一个“名角挑班”、观众说话的时代,观众就是市场。而京剧得以再次以完全面目呈现的时候,它已经被“圈养”起来,自由度欠缺,排什么戏、让谁来演,常常围绕着体制内的奖项和“政绩”在运转。一些京剧团并不缺钱,只是钱没有用在演员和观众身上,而用在了门面上。这种资源配置方式,付出了巨大机会成本,一次次错过了争取观众的时机。而为了引起注意,一些戏耗资大,讲排场,但往往演了几场就偃旗息鼓。

► 收入低下与人才缺乏互为因果

关于“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京剧市场的萎缩”这一问题,每一个人所做的回答都可能是片面的,最没有犯错风险的说法是,京剧和许多传统文化、习俗、工艺、语言一样,都在逐渐丧失繁荣乃至存活的社会条件。当代,简明直接的大众文化成为人们部分摆脱孤立感的一个重要纽带,而高欣赏门槛的京剧,的确无力承担这一功能。

动画电影《麦兜响当当》里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:“麦仲肥”在古代就发明了电话,但是因为没电,所以他的电话到死也没响过。这就像一个寓言:东西是好东西,但没有与社会连为一体的通路,难免成为一个摆设。

一部烂电影,可以让一桌子陌生人热闹起来,但一台再出色的京剧也做不到这一点。所以改革呼声四起,人

们希望把这种社会纽带功能改出来。至于改了之后是不是京剧,倒也不必担心。有能耐赢得观众,塑造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也不是坏事。然而无论怎么改,京剧人的充分自主和对结果完全负责恐怕都绕不过去。

“放养”对于从业者有极大的风险,也曾有京剧名角儿尝试过,最终失败回到原点。但没有“放养”,即便有足够的意愿维持京剧的存续,也无法解决一般京剧人收入无法跟上社会平均水平的问题,而这个问题正变得日益致命。

还记得十几年前,在现场看于魁智录制节目,说起帮剧团管行头的老师收入之低下,于魁智几乎落泪。相比老一辈,这个行业的劳动的边际收益早已递减,对于王金璐先生这一代而言,从窝头到白面馒头算得上质的

飞跃,而在今天,学戏的付出与收入大不相称,甚至让人不可忍受。

收入低下与人才缺乏互为因果。一方面,包括王金璐先生在内的老艺术家们,一直在忧虑京剧的后继乏人。他们先是在青少年时代被生计问题逼成了一个大师,随后又在晚年被传承问题逼成了一个悲情的理想主义者。

另一方面,京剧的演出水平在下降。前段时间看了一台“改良”过的梅派折子戏,演员一开腔就让人心里凉了半截,几处关键的下腰也不到位。这与王金璐先生年近八十演出《挑滑车》仍然不折不扣地“摔僵尸”比起来,后辈当知汗颜。

现在,王金璐先生去了,武生泰斗的气度和风范,恐怕将来也不再有了。

(李纯方)